

术语重构视域下中日文献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研究

魏海燕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要: 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种文化重构过程。本文拟以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日译本为例, 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中日译本核心概念中术语重构的文化差异。通过具体词例比较译者们对一系列核心术语的不同处理方式, 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汉语和日语各自不同的语言特点, 更折射出中日两国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思想路径及文化心理。对比“幽灵”“阶级”“无产者”等关键术语的中日不同译法, 能够深入理解术语重构背后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文献翻译; 术语重构; 中日文化差异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7. 026

引言

翻译, 远非两种语言之间机械的符号转换, 其本质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重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不仅是语言的桥梁, 更是思想的阐释者与文化的中介。不同时期的译者都必须在源文本的异质性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之间进行权衡并加以创造, 最终所选择的每一个词汇、每一种句式, 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预设与思想意图。这一特性在政治哲学经典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为这些文本的传播, 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纲领性文件, 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史, 便是一部生动的翻译与文化重构史。当这部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思想巨著跨越重洋, 抵达我们身边时, 它首先面临的便是语言的“本土化”挑战。中日两国作为东亚近代化进程中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两大重镇, 其早期译本——尤其是幸德秋水、堺利彦的日译本(1904年)与陈望道的中译本(1920年)——在处理一系列核心术语时, 呈现出显著而耐人寻味的差异。

这些差异并非偶然的语言现象, 而是两国在接纳马克思主义时不同思想路径与文化心理的集中投射。例如, 对于开篇名句“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中的“Gespenst”(幽灵), 日译本选择了更具文学性与具象色彩的“亡霊”, 而中译本则采用了更具抽象性与象征意味的“幽灵”。这一选择背后, 是明治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文学化引介, 与五四时期中国革命者对理论武器化建构的不同诉求。同样, 在对“Klasse”(阶级)、“Proletarier”(无产者)等核心概念的处理上, 两国译者也分别加入了各自的社会文化理解, 使得这些术语在进入本土语境后, 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生命力。

因此, 本文旨在通过对《共产党宣言》中日早期译本中“幽灵”、“阶级”、“无产者”等关键术语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分析, 深入探讨术语重构背后的文化意义。研究将揭示, 翻译不仅是思想的“传送带”, 更是思想的“锻造炉”。中日译者如何通过语言的重塑, 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幽灵”内化为本国文化肌理的一部分, 不仅反映了两国语言的结构特点, 更深刻地折射出近代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时, 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与思想抉择。通过这一比较, 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传播与变异, 也能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个案分析。

术语的翻译是思想传播的关键环节, 尤其是在《宣言》这样一部充满革命性概念的文本中, 术语的选择往往直接影响到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接受。从“Proletarier”(无产阶级)这一核心术语的翻译变迁中, 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博弈的深刻痕迹。在术语重构过程中, 译者所选择的译名, 往往超越了其字面意义, 成为一枚枚蕴含丰富信息的“文化密码”。这些“密码”既内嵌了源文本的思想精髓, 又巧妙地编织了目标语的文化脉络、历史记忆与时代诉求。它们是译者文化立场、思想预判与翻译策略的结晶, 也是外来思想能否在本土土壤中生根发芽的关键所在。因此,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传播与接受, 就必须首先破解其核心术语翻译中所隐藏的这些“文化密码”。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其早期中日译本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分析样本。译者在面对“幽灵”、“阶级”、“无产者”等一系列充满革命性与颠覆性的核心概念时, 是如何进行词汇的筛选、意义的嫁接与语境的重塑的? 这些选择背后, 又折射出两国怎样的文化心理与思想路径? 本部分将以此为切入

点,通过对关键术语的译法进行细致的对比与剖析,逐步揭开术语重构背后那层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密码,进而揭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思想移植与本土化过程中的核心机制。

1 “幽灵”一词的翻译选择与象征意义

《共产党宣言》开篇即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德语: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 - 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日语:一つの亡霊が欧羅巴を徘徊している——共産主義の亡霊が。)的著名句子引发全篇,这一隐喻性表述在各国译本中产生了丰富多样的译法。在日语译本中,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直接将“幽灵”译为“亡霊”(亡灵)。这种译法与日语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日语中“亡灵”一词常带有神秘、异质且令人警惕的意味,能够唤起读者对未知事物的敬畏与好奇。值得注意的是,堺利彦在1904年11月为《平民新闻》创刊一周年纪念号撰写的一篇关于《宣言》的讲演中,就曾特别阐释了“幽灵”这一名称的含义,指出《宣言》虽然表面上看是1848年春巴黎、伦敦的共产党同盟发表其主义、政见,但“实际上是作为起草委员的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以此为契机,将其多年积累的历史上、经济上的新学说发表的作品”。他对“幽灵”的这种解读,暗示了日本译者选择“亡灵”一词时,可能有意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冲击性。

相比之下,中文译本对“幽灵”一词的翻译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早期中文译本如1908年的民鸣译本将其译为“异物”,1920年陈望道译本则译为“怪物”。这种译法直接受到了日文译本的影响,因为陈望道在翻译时参考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日译本。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译本中“幽灵”这一译法直到1943年博古译本才正式确立,并在此后成为标准译法。这种变化过程反映了中文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深化的轨迹——早期译者倾向于使用更具冲击力和视觉化的词汇(如“怪物”),而后期译者则选择了更贴近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幽灵”一词。从“异物”到“怪物”再到“幽灵”,这一演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读者对共产主义从陌生到理解、从恐惧到认同的心理轨迹的文本反映。

“幽灵”一词在不同语言中的翻译差异具有深层的象征意义。在德语中,“Gespenst”一词既指幽灵、鬼魂,也有幻象、幻影的含义,暗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思想在当时欧洲社会中的非实体性和争议性。日语的“亡灵”则更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异质力量的视觉冲击力和神秘感,这与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既向往又警惕的复杂心态相吻合。而中文最终

确立的“幽灵”译法则保留了德语原词的哲学意味,暗示共产主义虽然当时在现实世界中尚不具实体,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和思想幽灵在欧洲游荡,预示着未来的改变。这种差异表明,译者对术语的选择不仅受限于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更受到各自文化传统中隐喻系统的深刻影响。

2 “阶级”概念的语言适应与本土化

“阶级”(德文:Klasse)是《共产党宣言》中另一个核心概念,指涉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对立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结构。在日本译本中,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阶级”直接译为“阶级”(階級),这一译法与日语固有词汇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多采用“和制汉语”的方式,即借用汉字组合来构建新概念,这些概念既保留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又融入了日本的文化语境。在1903年幸德秋水撰写的《社会主义精髓》中,已参考不少西方社会主义书籍,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这些著作中的“阶级”概念显然影响了日本译者的术语选择。

与此相对汉语译本对“阶级”的处理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陈望道在1920年的译本中同样使用了“阶级”这一译法,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阶级”一词原本指代社会地位的高低差异,如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则强调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经济地位划分。这种概念的转换对早期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认知挑战。陈望道译本中的“阶级”一词,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等级观念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语义转换,这一过程需要读者同时进行语言学习和思想重构。据淮北师范大学教授郝文清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报纸杂志和各种翻译出版物中,有关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就有近20种,“阶级”等术语的译法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这种术语的多样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传播初期的混沌状态,也说明译者们正在探索最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

中日译本在“阶级”概念上的处理差异,反映了两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发展路径。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更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能够直接将德文或英文著作翻译为日语,保留了更多原概念的理论精确性。而中国译者则多通过日文转译,这种“间接翻译”虽然降低了翻译难度,但也可能造成概念理解的偏差。正如方红在《〈共产党宣言〉中日首个全译本比较研究》中所指出的,“《宣言》在日本的早期译介及其日译本对中

译本的影响和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日本译本对“阶级”等核心概念的翻译模式，为中国译者提供了现成的术语体系，但同时也可能限制了中国读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原创性理解。

3 “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的术语建构

“无产者”（德文：Proletariat）和“资产阶级”（德文：Bourgeoisie）是《宣言》中描述两大对立阶级的关键术语，它们在两国译本中的处理方式同样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日本译本将“无产者”译为“無産者”，这一译法直接对应德文原词，但在日语中具有特殊的发音和语义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翻译这些术语时，往往采用“音读”和“训读”相结合的方式，使这些新概念既具有学术精确性，又融入日常语言使用。例如，在幸德秋水 and 堺利彦翻译的《宣言》中，“无产者”不仅是一个理论术语，也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动员工人的口号，这种双重功能在日本的社会语境中得以实现。

中国译本同样使用了“无产者”这一译法，但早期译本中也曾出现过“劳动者”、“贫民”等替代性表达。陈望道在1920年的译本中确立了“无产者”的标准译法，这一选择既参考了日文译本，也考虑了汉语的表达习惯。有趣的是，在陈望道译本中，“无产者”的作者译名为“马格斯”和“安格尔斯”，而非我们今天熟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译名差异反映了当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不成熟状态，也说明术语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据郝文清的研究，中国革命先驱李大钊在马克思中文译名的最终确定上起到关键作用，而“马克思”这个中文译名和原文发音相近，具有简单明了、读写方便，符合我国语言习惯的天然优势，从而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同样，“无产者”这一译法的确立也经历了类似的选择过程。

“资产阶级”的翻译同样呈现出文化差异。日本译本将其译为“資本家階級”，这一表达直接对应德文“Bourgeoisie”的经济含义，强调其作为资本占有者的阶级属性。而中国译本则更多使用“资产阶级”这一译法，有时也译为“资本家”或“有产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产”一词原本指代个人财产，而“阶级”则指社会地位，将两者结合而成的“资产阶级”概念，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分析框架。这种术语建构过程既体现了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重构中国社会认知的努力。

中日译本在“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等术语上的处理差异，最终导致了两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不同

发展路径。日本社会主义者能够较早地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应用于日本社会分析，如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精髓》中就详细分析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中国译者则多停留在术语引进阶段，直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才与中国社会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差异部分源于日本明治时期更早的现代化进程，也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有关。术语重构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思想适应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日译本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为比较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路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4 结语

通过对《共产党宣言》中日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的比较分析，不仅深化了对《宣言》翻译史的理解，更在于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支撑。翻译活动远非语言层面的机械转换，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重构与思想博弈。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所选择的每一个译名，都不仅是对原文概念的对应，更是一枚承载着特定文化密码的符号。这些“文化密码”既反映了源语言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也折射出目标语社会的文化心理、历史语境与思想取向。中日两国在“幽灵”、“阶级”、“无产者”等关键术语上的译法差异，正是两国在接纳马克思主义时不同文化立场与思想路径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 [1] 魏海燕.《共产党宣言》中日译本早期翻译传播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5(04)
- [2] 刘明远. 基于文体视角的《共产党宣言》标点符号诠释[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3)
- [3] 方红; 王克非.《共产党宣言》中日首个全译本比较研究[J]. 中国翻译, 2014(06)
- [4] 吉田阳介.《共产党宣言》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1)
- [5] 李春兰; 孔令翠; 刘海鸥.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细节考证[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12)
- [6] 魏海燕. 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助推一带一路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4)

作者简介：魏海燕（1981.10），女，汉族，籍贯陕西，教授，硕士，西安翻译学院，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党宣言》中日译本历时比较研究(2022K016)阶段性成果。